

王 俭 论

乔 好 勤

王俭，字仲宝，生于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卒于齐武帝永明七年(公元489年)，享年三十八岁。但他在宋齐代兴之际却是政治舞台上极其活跃的人物，以佐命起家，官至总揽朝政的宰相，对于肖齐王朝的开基和政权的巩固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王俭又是一个学者，他于经学(主要是礼学)、史学(主要是谱学)、文学和目录学均有较深的研究，著述甚多，①影响颇巨，时人谓为“一代人宗”，②后人称为“文臣之首。”③研究和探讨王俭的政治活动、学术思想以及二者的联系，对于了解南北朝史，特别是宋齐以后思想文化发展的特点，是有帮助的。历代史著中关于王俭其人多所涉及，但缺乏全面系统的专题论述。我这里结合王俭的政治活动，对他的一些思想和学术成就作粗浅的探讨。

一、黜昏立明与五德相生论

王俭生而父遇害，为叔父僧虔所养。数岁袭爵豫宁侯。及长，尚阳羨公主，拜驸马都尉，解褐秘书郎、太子舍人，超迁秘书丞。出为义兴太守，还为黄门郎，转吏部郎。肖道成为太尉，引王俭为右长史，又转左长史、右仆射。二十岁前后的王俭可谓安流平进，如坐春风。

但是此时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达到炽热程度，一次新的废立和流血正在蕴酿之中。公元477年，太尉肖道成废杀刘昱，立刘準为帝，越二年，刘準禅位，齐朝建立。

在这次废立和王朝革易的大变动中，宫廷内部戮力相助者有之，静观左右者有之，起而反对者有之。那么，王俭的态度如何呢？赵异《二十二史札记》中说：“所谓高门大族者，不过雍容令仆，裙履相高，求能如王导、谢安，柱石国家者，不一二数也。次如王弘、王曼首、褚渊、王俭等，与时推迁，为兴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朝市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

事实上，王俭和司空褚渊、尚书令王僧虔等人的态度是不同的。渊虽“归心”肖道成，但“默然”不语；④当肖自白于渊，渊曰：“今授始尔。恐一二年未容便移。”⑤王僧虔和王延之则老谋深算，作壁上观。《南齐书》卷三十二《王延之传》中有一段形象的记载：“宋德即衰，太祖辅政，朝野之情，人怀彼此。延之与尚书令王僧虔中立无所去就，时人为之语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

王俭则以风华年少，积极参预其事，是肖道成废弑刘昱，挟刘準禅位，齐台建基的得力助手。《南史·王俭传》云：“俭素知帝(案：指肖道成)雄异，后请间言于帝曰：‘功高不赏，古来非一，以公今日地位，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内和。俭因又曰：‘俭蒙公殊眄，所以吐所难吐，

何颺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徽之淫虐，非公岂复宁济；但人情浇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复推迁，则人望去矣，岂唯大业永沦，七尺岂可得保？’帝笑曰：‘卿言不无理。’俭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经常宰相，宜礼绝群后，微示变革。……俭请衔命。’”

当肖道成亲自和褚渊商量废黜之事时，褚以为“未必便在旦夕。”肖言于王俭，俭曰：“褚是未达理。”俭又笼络善于辞翰的中书舍人虞整，私自作诏。后来，肖道成引他为左长史，“恩礼隆密，专见任用。”及肖登基“大典将行，俭为佐命，礼仪诏策，皆出于俭。”⑥

二十八岁的王俭，由于助肖氏有功，齐朝建立，迁为左仆射，领吏部，封南昌县公，食邑二千户。

出身王氏大族、身为宋室駙马的王俭，为什么如此倾心于肖道成，不顾身家性命，策谋奔走，废宋立齐呢？历史又该怎样来评价王俭的功罪？

首先，王氏世族与刘氏宗族有矛盾，王俭与刘氏有世仇。宋齐之世，门阀世族观念已成，寒门士族出身的刘氏一方面需要和王谢高门士族合作，维持其统治地位，阻止庶族的上升；同时与高门世族之间也有不少猜忌和矛盾，意欲剪其气焰。他对太原王愉一家的诛杀即是一例。刘裕官位尚微时，“愉不之礼，既得志，愉合门见诛。”⑦“刘氏因其积愤，屠灭王氏”，⑧不止于王愉一家。王俭之父僧绰，为废立事，被太子劼收害之，其母武康公主少与明帝不协，明帝即位，欲开其塚离葬，王俭上书自陈，密以死请，方罢。其弟逊，因不蒙封赏，有怨言，被“远徙永嘉郡，于道伏诛。”这种家遇，不能不给王俭埋下仇恨的种子。

其二，黜昏立明，顺乎民心。刘宋后期各帝，多荒淫暴虐。前废帝刘子业恣意诛杀，荒淫残暴，强迫左右奸人妻女，为其姐姐山阴公主置面首三十人，将他的三个叔叔装在笼子里捶打，以木槽就食，取名猪王、杀王、贼王。太后气得要剖腹，说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儿子。后废帝刘昱更凶残，经常带人夜游，见人便杀，弄得人们日夜闭户。一日突入领军府，以肖道成的肚脐当箭靶，左右劝用髓箭，一射中脐，道成才幸免于死。对这样的昏君，人们自然恨入骨髓。废立之举，已是人心所向。元徽五年夏四月，豫州刺史阮佃夫、步兵校尉申伯宗、朱幼即欲废立，事泄伏诛。帝常侍杨玉夫尝切齿曰：“明日当杀小子，取肝肺。”齐高帝亦先与袁粲、褚渊言废立，袁、褚不敢承而止。“是当时朝野内外，本无一不以苍梧为当废，齐高之举，固协于天下之公。”⑨王俭与肖道成废立策谋是顺乎民情的。

弑君废立，自为大逆不道，故史著常常讳之莫深。南北朝之世，君王多无道，废立为常事，且引经据典，以黜昏立明为正理，作事则名目张胆，于史则不加掩饰。有宋一朝，废立即有数起：刘劼弑父文帝自立，武帝又杀刘劼夺得王位，少帝刘义符为徐羨之所弑，前废帝子业为明帝结阮佃夫所弑，阮佃夫等又欲废苍梧王未果，后为肖道成心腹王敬则、杨玉夫等所弑，顺帝刘準受挟禅位于齐，后被害。凡此种种，时论但以废弑为过，不以废立为非，视之如常理。

刘裕受禅之时，诏书中引唐、虞、汉、魏故事，谓“是用仰祗皇灵，俯顺群议，敬禅神器，授帝位于尔躬。”晋帝握笔签字时尚谓左右曰：“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⑩宋禅位于齐的诏策中写得更明晓：“自轩黄以降，谱索所记，略可言者，莫崇乎尧舜。披金绳而握天镜，开玉匣而总地维，德之休明，宸居灵极，期运有终，归禅与能。所以大唐逊位，喁然兴歌，有虞揖让，卿云发采，遗风余烈，光披无垠。汉、魏因循，不敢朱坠，爰逮有晋，亦遵前典。”⑪

元嘉末年，文帝颇以后事关怀。刘劼欲废立，事已泄，文帝还使王僧绰“寻求前朝旧典”，“又令撰汉、魏以来废诸王故事送与江湛、徐湛之”，“议夕不决”，以致刘劼抢先一步，铸成

千载之恨。^②

肖道成在答沈攸之书中，自认黜昏立明，理所当然：“黜昏树名，实维前则，宁宗静国，何愧前修？”^③

可见南北朝之时，人们视废立为常事，亦视废立为常理，故史官著书亦详述废立经过，不为之讳。（当然史书著者是站在本朝立场上述事的！）王俭生在宋齐间，其对废立的认识自然不会脱离时代，虽出身豪门望族，亦积极为肖氏代宋奔走效命。

同时，从王俭个人来说，他不甘居人之下，“少有宰相之志”，也是他参预废立的一个原因。二十岁左右，他曾写过一首诗《春日家园》：“徒倚未云暮，阳光忽已收。羲和无停晷，壮士岂淹留。冉冉老将至，功名竟不就。稷契匡虞夏，伊吕翼商周。抚躬谢先哲，解绂归山丘。”^④司徒袁粲见之曰：“宰相之门也。栝柏豫章虽小，已有栋梁气矣，终当任人国家事。”^⑤虽然他年纪不大，但看到光阴荏苒，功名不就，也颇有怀才不遇之感。他在《畅连珠》一文中更明显地流露出这种思想：“盖闻王佐之才虽远，岂必见采于当世，凌云之气徒盛，无以自致于云间。是故魏人指玉于外野，和氏泣血于荆山。”^⑥

肖道成造基大业多年，废立之势已成，王俭又“雅道自居，早怀伊、吕之志，竟而逢时遇主，”^⑦这个机会，他是不会轻易放过的。因而王俭与一般静观左右以保家世的士族子弟不同，是这次历史变革中的积极参加者。

王俭参赞齐高代宋所使用的思想武器是“五德相生论”。五德即五行，五行相克论到西汉发展成五行相生论，是汉代经学家用以推演历史变革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体系。刘歆曾以此说王莽以火德继汉水德，篡汉称帝是天命使然。

五行经纬之学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用以欺骗人民的一种工具，虽然南朝宋孝武帝曾开禁经纬之例，但王俭等人在帮助肖道成夺权篡政之时，仍然以此作舆论准备和制造理论根据。

由他起草的《策齐公九锡文》中就开始宣扬：“嗣君失德，书契未纪。威侮五行，虔列九县。”在《策命齐王》中说：“仍世多故，日蚀星孛，山沦川竭……皇绪将淹……。”在《再命玺书》中说：“昔金德既沦，而传祚于我有宋，历数告终，实在兹日。亦以水德而传于齐。式遵前典，广询群议，王公卿士，咸曰惟宜。”^⑧由褚渊起草，王俭参治之的《禅诏策》也说：“象纬昭彻，布新之符已显，图纆彪焕，受终之义既彰。”

在作出“三让不受”之态，表演了戏剧式的“禅让”仪式之后，于公元479年肖道成建立了齐朝。他吸取宋室内相残杀，外施暴政，致使国饥民穷，臣不自保，亡国禅位的教训，采取一些安民富国的措施，使南朝民众得以休养生息，经济出现暂时的繁荣。正象历史学家们肯定刘裕等人在宋初的功绩一样，这一时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汉族历史的发展也是一个大的贡献。我们对佐命宰相王俭的历史作用也是应当予以适当肯定的。

二、以礼治国与王俭的经学

《南齐书·王俭传》说：“俭谓人曰：‘江左风流宰相，唯有谢安’，盖自比也。”学者于此，多谓这是王俭“只有位，没有权”的“牢骚”。^⑨

肖齐建元元年，王俭二十八岁即为右仆射，领吏部，封南昌县公，食邑二千户。二年转左仆射，领选如故。三年加领太子詹事。四年三月拜尚书令，兼侍中。武帝永明元年加封卫将军。二年加领丹阳尹。三年兼领国子祭酒，加太子少傅。五年又加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如故。七年五月卒于此职。关于尚书令的职权，王俭自己说过：“今之尚书令，古之冢宰，虽

秩轻于衮司，而任隆于百辟。”^{②0}冢宰即后来总揽朝政的宰相，官居百僚之上，三十多岁的王俭以谢安自比，该是自鸣得意，不会纯然是牢骚。

首先，他很得高武二帝的信任，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起先，肖道成欲筹帝业，于弑废、受禅诸事，无一不对王俭言，“恩礼隆密，专见任用。”及“大典将行，俭为佐命，礼仪诏策，皆出于俭。”登基之后，有过必谏，谏无不允。肖道成曾谓俭曰：“卿谋谟之功莫与为二”，“卿与我情期异常。”^{②1}又叹曰：“《诗》云：‘维岳降神，生甫及申’。今亦天为我生俭也。”^{②2}肖道成去世之前，所委顾命大臣只有二人：司徒褚渊和左仆射兼尚书令王俭。死后，遗诏以王俭为侍中、尚书令、镇军将军。世祖即位，进号卫军将军。二年又为太子少傅、本州中正。《南齐书》称：“世祖深委仗之，士流选用，奏无不可。”有疾，帝亲临视之。王俭死，帝“痛酷弥深”，“言寻悲切，不能自胜”，诏“赠太尉、侍中、中书监、公如故”，葬礼依故太宰褚渊故事，谥文宪公。^{②3}

受到这样的恩宠，王俭可谓是“逢时遇主”，自然他也就和那些“不以物务关怀”的世族子弟不同，而“唯以经国为务”。

刘宋朝后期，皇宫贵族荒淫残暴，沉浸于声色狗马之中。齐朝建立，需要的是节俭与私静；连年内战，相互残杀，需要的是安宁和与民休息；订礼仪、正朝纲，对于新朝代的巩固也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在这些方面，王俭做出了许多努力。

《南史·齐本纪》说肖道成“及即位后，身不御精细之物，主衣中有玉介导，以为侈奢之源，命打破之。凡异物皆令随例毁弃。后宫器物栏槛，以铜饰之，皆改用铁。内殿施黄纱帐，宫人著紫皮履。华盖除金华爪，用铁回钩。每曰：‘使我临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欲“以身率下，移风易俗。”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以身作则移风易俗，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而王俭确是比肖道成更提倡节俭，反对奢侈的。建元二年，肖道成欲坏宋明帝紫极殿，以材柱起宣阳门。俭与褚渊、王僧虔联名上表谏曰：“臣闻德者身之基，俭者德之舆”，“三农在日，千畝成事，辍望岁之勤，兴土木之役，非所以宣昭大猷，光示遐迩。”^{②4}被高帝采纳。他在《高帝哀策文》中称其：“所尚维简，所宝唯贤。居尊弥约，无善不延。”^{②5}实际是他自己思想的表述。他在生活方面亦寡嗜欲，无姬妾；车服尘素，家无遗财。虽为大族，还是注意节俭的。

齐朝建立后，采纳了刘焯“想久安，要宽厚”的建议，停止了皇族内部的互相残杀。高帝死时还嘱咐武帝说，刘氏如果不是骨肉相残，他族绝不会夺取王位。武帝遵嘱不杀诸弟，朝政也较为严明，十几年间既无内争，也无外战，使“南朝民众又得到一个休息和发展生产的时期。”^{②6}

由于实行“土断”和“清检黄籍”，使户口增多，相对减轻了民众的负担。范文澜先生说：“对民众的剥削比宋朝轻些，因而隐定了齐朝的政权。”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都得到一定的发展，经济呈现暂时的复苏繁荣景象。《南齐书》“良政传序”中说：“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袿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

这里虽然不无溢美之词，但是齐高、武二帝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对于进一步开发江南，恢复生产，促进江南繁荣和提高民众生活是有利的。而这十许年正是王俭宰国的时期。

王俭辅政，广交贤能，对于才学之士“多所引进”。有一谭姓者，长于典故学，“俭尝其善据，卒得职”。又先后以庾杲之、何昌寓为长史，并谓何曰：“后任朝事者，非卿而谁？”曾荐李安民为尚书左仆射、孔透何宪使虏。何、孔二人皆好典故学，强学博识，是王俭的得力助

手，时人谓之“王俭三公。”王俭还向齐高帝推荐文章谢朓、江淹、王遂之等，并以谢朓为东阁祭酒，以江淹掌史职，以王遂之参定齐国仪礼。文学家任昉亦曾“以笔札见知。”

王俭一直负责人才的选取，重视人才的培养。魏晋以来，国学逐废。齐永明三年，诏省总明观，于俭宅开学士馆，立国学，王俭以尚书令领国子祭酒，任用和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南齐书》称其“士流选用，奏无不可”；任昉《王文宪公集序》称：“昔毛玠之公清，李重之识会，兼之者，公也。”又说：“国学初兴，华夷慕义，经师人表，允资望实”，“持论从容，未尝言人所短，弘奖风流，许与气类，虽单门后进，必加善诱。……公铨品人伦，各尽其用。”可见其奖掖后进，用力之勤；量才用人，所持较平。

但是更为突出的是他对经礼的研究和对齐王朝礼乐制度的订正和改革。王俭“幼有神采，专心笃学，手不释卷。”^{②7}“宏览载籍，博游才义。若乃金版玉匮之书，海内名山之旨，沈郁澹雅之恩，离坚合异之谈，莫不掇制清衷，递为心极。”^{②8}司徒袁粲叹曰：“衣冠礼乐在是矣。”^{②9}

王俭“弱年便留意《三礼》，尤善《春秋》，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③0}何承天曾撰《礼论》三百卷，俭抄为八帙，又别抄条目为十卷（姚振宗认为八帙当为八十卷，因为六朝人以十卷为一帙。）他对舆服、丧葬诸礼钻研尤深。齐朝初建之时，礼议诏策，咸出其手，舆服礼制，多依俭议。他强调服饰的重要说：“《春秋》《国语》云：“貌者情之华，服者心之文”。严廊盛礼，衣冠为大，是故军国异容，内外殊序。”^{③1}所以他对当时的朝服、乘舆、祀讳、丧葬等皆有论述。他议论礼制时多引经据典，以前有为准，但也有独出心意、因时制宜、加以改革的地方。如他在《公府长史朝服义议》中说：“伏寻皇宋受终，每因旧制，律令条章，同规在昔。若事育宜，心合征改。”^{③2}永明三年当南郊祭，而立春在郊后，世祖欲迁日，王俭启云“无烦迁日。”^{③3}

王俭特别强调《孝经》的作用及其在经学中的地位。永明三年，王俭于崇正殿讲《孝经》，以摘句令太子仆周顒为义疏。至顒卒官时，王俭讲《孝经》尚未结束。五年冬，文惠太子临国学，提出许多关于孝慈、敬爱、尊卑的问题，王俭老于典故，一一作了解释，并且说：“夫孝理弘深，大贤方尽其致。”^{③4}

汉代五经博士，不特立《孝经》，齐国子学中除设郑、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谷梁》外，还立了郑玄《孝经》。度支尚书兼国学博士陆澄谓俭曰：“《孝经》，小学之类，不宜列在帝典。”并上书王俭，讨论立学之旨。对于《易经》郑玄、王弼并立，《左氏春秋》杜预、服虔并立，《公羊》立何休，《谷梁》立麋信，他们的看法都是相同的。唯于《孝经》，二人有不同意见。陆澄书中说：“世有一《孝经》，题为郑玄注，观其用辞，不与注书相类。案玄自序所注众书，亦无《孝经》。”意思是说《孝经》郑玄注可能是伪造，又属于小学之类，不宜列于国学。王俭则认为：“仆以此书明百行之首，实人伦所先，《七略》、《艺文》并陈之‘六艺’，不与《苍颉》《凡将》之流也。”又说：“郑注虚实，前代不嫌，意谓可安，仍旧立置。”^{③5}

王俭不仅在太学里为《孝经》立了博士，而且在他编撰的目录著作《七志》中，把孝经类排列于第一部类“经典志”中的最前面，冠群书之首。利用目录学知识再次肯定孝经在百科学术中的领先地位。

王俭治礼，不以寻章摘句为务，主要为了经世致用。《南齐书》说他：“晋宋来施行故事，撰次谄记，无遗漏者。”所以“当朝理事，断决如流。每博议引证，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无能异者。令史踏事，宾客满坐，俭应接铨序，傍无留滞。”可见其不仅谙熟经典故事，而且能据典以言事，解决实际问题。难怪他讽刺陆澄为“书厨”。《困学纪闻》卷五引朱熹说：“朱文公谓六朝人多精礼学，当时至有以此专门名家，每朝廷有大事，常用此等人议之。”^{③6}王俭之

礼学堪称南朝之“专门名家”。

王俭有关经学方面的著述很多。除《南齐书》本传说他“少撰《古今丧服集记》并《文集》，并传于世”外，据《隋书·经籍志》和《新旧唐志》等著录，还有《尚书音义》四卷，《丧服图》一卷，《礼论要钞》八十卷（从姚氏《考证》说）、《礼答问》三卷、《礼义答问》八卷、《春秋公羊音义》二卷、《孝经义疏》一卷、《皇宝书仪》七卷、《弔答仪》十卷等，皆亡，唯有马国翰所辑《礼义答问》一卷见存。

由于王俭对经礼的研究和倡导，使魏晋以来日渐衰微的经学“大振”。

三、门阀世族观念与王氏谱学

南朝君王多出寒门，对豪门世族不无怨忌。加之大族士子以门第自矜，而庶族寒人努力仕进，所以寒人势力逐渐抬头。赵异《札记》从大势着眼，作了对比：“其时高门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人主遂不能借以集事。于事，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

寒人，是指那些出身卑微的非身份性地主阶级，即寒门士族，他们的上升不出两途：一为中书通事舍人，掌管机要，由于和皇帝十分亲近，权力之大，将相莫敢违；一为以战功封将帅。南北朝时期，有些豪门大族在统治阶级的内争中被残杀，有的则死于农民起义者之手。所以北府、西府的兵权落入庶人手中，即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者也。

寒人的抬头，只是反映了下层地主阶级的兴起，但是新贵族和豪门世族仍占绝对统治地位，享受着特殊的权利。自魏立九品中正，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大权美仕，俱在豪族，寒人但能为吏。士庶之间仍然有着明显的区别：“论人物者，尚数门第，课刑罚者，尚恕大族。”“论家世而轻现任，背王命而炫清华，甚至一坐之微，亦乃加以矜持。”“门阀之荣，永世常在。祖宗之微，辱及子孙，甚至眼前富贵，不如家世之可矜。”^{③⑦}这正是南朝风气。

琅琊王氏是晋以来的头等大户。王导为东晋丞相，其子洽为中领军，洽子珣为司徒，珣有五子，其中王弘为宋太保，王俭之祖王曇首为太子詹事，其父僧绰为尚书吏部郎，参掌大选，叔僧虔赠司空。王俭的两个儿子：騫为司徒右长史，至梁为度支尚书，曠为尚书左丞。《南史》“王俗之传”云：“东晋初渡江，王导卜其家世，郭璞曰：‘淮水竭，王氏灭’。”时谚曰：“王与马，共天下。”王氏家族的门望地位可想而知。

王氏家族中常以门第自矜者不泛其人。王融与人说：“仆出于扶桑，入于汤谷，照耀天下，谁云不知。”^{③⑧}王僧祐则以清高自许，“肆情运气，不顾朝典，扬眉阔步，直轡高驱。”^{③⑨}中书舍人狄当诣王曇首家，不敢坐；中书舍人弘宣宗为文帝所爱，文帝说你要当士大夫，只有和王球同坐，弘奉旨见球，就坐，球举扇拒绝，文帝闻知亦无可奈何。王俭子騫亦以门第高自标置：“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进，不须苟求也。”^{④⑩}王氏权贵们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把门第作天理国法看待。王弘说：“士庶之际，实自天隔。”^{④⑪}王球说：“士庶区别，国之章也。”^{④⑫}王俭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大家族中，门阀观念的存在是很自然的。

王俭从其阶级和门望出发，对当时寒人的抬头——权势的增加和地位的提高，是极为不满的。

小吏出身的茹法亮，官至中书通事舍人，权力很大，王俭常对人说：“我虽有大位，权岂及茹公！”^{④⑬}江湖行伍出身，善于拍张、弑苍梧五捉刀保肖道成做皇帝的王敬则，被封为

寻阳郡公、平北将军，后与王俭同拜开府仪同三司，徐孝嗣戏俭曰：“今日可谓合璧。”俭曰：“不意老子与韩非同传。”④引《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以示自己与王敬则不可作同日语。

东晋以来，不仅士族与庶族有别，南士和侨士，以及渡江先后的士族之间（后渡江者呼为伧）都有着明显的区别。王俭看不起南人。《南齐书·张绪传》说：“欲用绪为右仆射，以问王俭，俭曰：‘南士由来少居此职’。褚渊在座，启上曰：‘俭年少，或不尽忆。江左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俭曰：‘晋氏襄政，不可以为准则。’上乃止。”后来张绪之子亮，因为与王俭书中“辞旨激扬”而被“免官禁锢”。⑤

士族和庶族的区别在游宴食宿方面也是很明显的。豪门大族家子弟除官位和权势的高人一等外，就连住所、乘舆、服履、发饰等，以及手中的扇子、尘尾，说话的情态，走路的样子，也故意搞得和寒人不同。《王僧虔传》说：“兄子俭为朝宰，起长梁斋，制度小过，僧虔视之不悦，竟不入户，俭即毁之。”⑥可见王俭很讲究屋宇之饰。王俭又作“解散髻，斜插幘簪，朝野慕之，相与仿效。”⑦可见王俭也很讲究衣履发式。时人既有“渊既世族，俭亦国华”⑧之誉。他在《太宰褚彦回碑文》中有一段描写，实际上也是自我写照：“出陪銮辂，入奉帷殿，仰南风之高咏，餐东野之密室，雅议于听政之晨，披文于宴私之餐。参以酒德，问以琴心……”，他以风流宰相谢安自况，多半指此。

寒人的兴起对士族和新贵族的地位不能说不是一种挑战，世家大族由极盛而衰落，使他们不得不千方百计地保护其特权。王俭的重视丧服和孝经的研究即部分地以此为目的。南北朝的谱牒学也是适应这一需要发展起来的。唐柳芳说：“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由是有谱局，令、史职皆具。”⑨

由于士族高姓在政治、经济、婚姻、社交等方面都享有特权，不少人私自作伪，或施行贿赂，冒充士族。有司选官，需先查牒谱，考其真伪，于是谱学日显重要，曹府亦专设谱局，命以令、史职其事。

当时避讳之风极盛，与人交谈不得触犯对方之祖讳；涉足官场，避讳更为讲究，否则会遭不意之祸。故人人必熟悉家谱。谱牒之学大倡，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江左谱学，以贾氏、王氏最为当时所重。所谓贾氏谱学，系指晋太元年间员外散骑侍郎贾弼所撰的谱状。他“广集众家，大搜群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诸大品、略无遗缺，藏在秘阁，副在左户。”其子匪之、孙希镜三世传学。王弘、刘湛好读其书。弘“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湛“始撰百家之谱。”⑩

所谓王氏谱学，即指王俭根据刘湛所撰加以改编之《百家谱》。《通典》说：“刘湛撰《百家谱》，伤于寡略，齐王俭复加得繁省之衷。”⑪《南齐书·贾渊传》中也说：“永明中王俭抄次《百家谱》，与渊参怀撰次。”刘书原二卷，王俭《百家集谱》十卷。后五邈之又续王俭《百家集谱》四卷，梁武帝时又命王僧儒改定《百家谱》三十卷，僧儒又有《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隋书·经籍志》说：“齐梁之间，其书转广。”谱系一类，通计存亡有书五十三部，一千二百八十卷。⑫可见王氏谱学影响之大。

王俭在所编《七志》中，尤其显示出其对谱学的重视。南朝以前的书目收录谱牒很少，更无谱牒专类。王俭《七志》的分类体系虽准刘歆，然却于六部之外，又立图谱一志，专门著录地图和谱牒，从历史的发展和整个学术体系上，肯定了谱学的兴起，确认谱学已为“专门之学”，并给予一个相当突出的地位。

四、王氏目录学及其学术渊源

魏晋谈玄之风，对南朝各代的学术有着巨大影响。

清谈是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建立而兴盛起来的，主要内容是“臧否人物”，初与老、庄无甚关系。^{⑤③}但是魏晋之士，慑于党锢之祸和统治者内部相残，“变而为旷荡，尚浮虚而亡礼法。”^{⑤④}“蔑周礼之书，崇老庄之教”，^{⑤⑤}以虚玄弘放为夷达，以儒术清检为鄙俗，用以逃避现实。放旷之风和清谈结合，是老庄玄学的兴起。所以魏晋以后清谈的主题便是《周易》、《老》、《庄》，以至于佛学了。

这种谈玄风气必然影响儒生研经。南朝经学家大都兼采玄学、佛学，以意解经。王弼的易学就是一个典型。宋泰始六年总明观设儒、玄、文、史四科，可知玄学影响之深。唐长孺先生曾分析说，北来侨士好玄谈，土著南士重视传统经学。^{⑤⑥}他举出南士陆澄与王俭论学书为例。书中说：“《易》……虽有异家之学，同以象数为宗。数百年后，乃有王弼。王济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顿废前儒。……晋太兴四年，太常荀崧请置《周易》郑玄注博士，行乎前代，于时政由王、庾，皆佛神清识，能言玄远，舍辅嗣而用康成，岂其妄然。太元立王肃《易》，当以在玄、弼之间。元嘉建学之始，玄、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置王，意在贵玄，事成败儒。今若不大弘儒风，则无所立学。众经皆儒，惟《易》独玄，玄不可弃，儒不可缺。谓宜并存，所以合无体之义。”^{⑤⑦}陆澄显然是在反对王弼的以玄解《易》。强调易学应以汉以前的象数之学为正宗。即使现在玄学成风，无法舍弃，也要郑玄《易》和王弼《易》并置，以免专尊一体之议。这是地道的推崇汉以来传统经学的议论。但是侨士王俭对此的态度却是高度赞同的。他在答陆澄书中说：“《易》体微远，实贯群籍，施、孟异闻，周、韩殊旨，岂可专据小王，便为该备？依旧存郑，高同来说。”^{⑤⑧}

王俭于《春秋》三传，也比较重视左氏，和汉代经古文学家的态度是一致的。他在国学里给《左传》立了服氏注和杜氏注两博士，而认为“《谷梁》小书，无俟两注。”《公羊》也只立何休注一家。王俭特别推重古文经学大师郑玄。陆澄对《孝经》郑玄注表示怀疑，反对立于国学，王俭不同意。理由是：①认为《孝经》“明百行之首，实人伦所先；”②刘歆《七略》、班固《艺文志》都将《孝经》置于“六艺”之中，又单独立类，和小学类区别开来；③《孝经》郑玄注的真伪，虽未弄清楚，但前人既未完全否定，就不必过分计较，仍旧可以立于国学。王俭最重礼学，范文澜先生说：“郑玄注《三礼》最称精密，南北儒生讲《三礼》，无不依据郑注。”^{⑤⑨}王俭所究，自不会例外。

王俭于史学，反对列《朝会志》、《列女传》，而主张立《食货志》。他说：“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货通则，国富民实。宜加编录，以崇务本。《朝会志》前史不书，蔡邕称先师胡广说《汉旧仪》，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议，无烦录。宜立食货，省朝会。”^{⑥①}司马迁《史记》虽无《食货志》，但已立《货殖列传》。班固在《汉书》中正式立《食货志》，以专记各时期经济发展情况。在史书中立《列女传》和《朝会志》是三国以后的事。王俭所论，意以《史》《汉》之例为本。

考王俭的目录之学，更可以看出其学术渊源来自两汉。

魏晋以来，我国目录之体例发生巨大变化。郑默、荀勖之《中经簿》，皆以四部分图书；体制之简陋，学者称为“单记书名而已”，并且“自尔因循，无所变革。”^{⑥②}

王俭的目录学一反苛简浑漫之风，所撰目录力追西汉刘氏。《南齐书·王俭传》云：“依

《七略》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献之，表辞甚典。又撰定《元徽四部书目》。”

《元徽四部书目》是刘宋宫廷藏书之简目，与魏晋南北朝各代官修书目体例相同。唯《七志》独出心裁，“成一家之言”，体例仿于《七略》。

《七志》依《七略》之处大体有二：分类和体制。

魏晋南朝，朝代不断更替，内争外战极多，图书数量有限。图书数量有限，而内容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如诸子著作之减少，史书之增加，佛道之产生等等。所以从魏郑默、晋荀勖和李充等皆以甲乙丙丁类分图书。虽然时论谓其“朱紫有别”，“秘阁以为永制”，有适应现实需要和学术发展的一面，但此时的四部法，既无类名，又无细目，“博览之士”不能不“疾其浑漫”。故王俭《七志》的分类体系，基本上采自《七略》。《七略》有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辑略实际是六略的说明，或曰小序的汇辑，故只有六部。《七志》的前六志与《七略》同，只是类名作了更改：认为“六艺”不足以包括儒家全部经书，故改为“经典”；“诸子”之名未变；以“兵”字浅簿，“军”字深广，故改“兵书”为“军书”；以“诗赋”之名不能包括其他文学形式，故改“诗赋”为“文翰”；以“数术”之称繁杂，故改为“阴阳”；以“方技”无典可据，故改为“艺术”。但其内容实质基本相同。王俭又于六志之后，更立图谱，以全七数；并“条《七略》和《汉艺文志》中经簿所缺之书，并方外之经：佛经和道经各为一录，虽继七志之后，而不在其数。”^②

图书分类体系是以学术分类为基础，并根据图书发展情况和社会现实的需要来确立的。虽然它仅仅是一个框架，却最能够体现目录编者的学术思想——他对一代学书概貌、各科学术流派的地位、渊源及其与现实的联系等方面的认识。

王俭《七志》的分类体系，显然体现出其对粗劣的四部法（与当时的浮旷之风有关）的不满，而竭力借用刘氏父子的《七略》分类体系，来纠正这种颓靡之风，为现实政治和统治阶级的需要服务。但是王俭并不全然墨守，而是根据需要作了不少变通的。类名的更改是其一，其二是“图谱志”的增加，显然是为了适应谱牒学、地图学的发展和维护门阀士族利益的需要。郑樵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其三，道经和佛经的著录，适应了二教在魏晋宋齐间的发展；道在佛前，也反映了魏晋以后玄道的兴盛和王俭“玄不可弃”，重道轻佛的思想。其四，将史书附于“春秋”，这在表面看来是违背学科发展和图书增多的情况的，是开了倒车，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王俭是不重视历史科学。正如王重民先生所说：“可能不是削弱而正是想提高史部书籍的地位。”^③其五、《孝经》列为群经之首，完全是出于维护封建世族和新兴贵族的利益而发的，同时这也是中世纪庄园经济在思想意识上的特殊反映。

《七志》的体制也和当时官修书目决然不同。

魏晋南北朝官修书目，除分类采取刚刚草创的四部法外，大多无提要叙录。甲乙记数，单录书名，故谓之宫廷书库之“簿录。”王俭《七志》是私人撰目之始，其体制与官目别行，大体以向歆叙录体提要目录为准，每书撰有提要，各类皆有序例。《隋书·经籍志》称其叙录“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卷首之中。”^④可见卷首条例相当于《七略》之“辑略”；书下叙录以“传”名，说明《七志》的提要偏重于人物之生平事迹。因为叙录之体本与列传相同或者相近。王俭出言谋事，好深远典据，故“变叙之名，从传之实。”^⑤同时也可能是受了当时清谈清议的影响，与传记史学和传记文学的发展有着某些联系。

总的看来，王俭在目录学和其他学术方面一样，与当时一般士子不求学问进取、一味放任旷达、谈玄吹嘘不同，以汉代学术研究为根本，又吸取新的学术营养，根据现实需要适当变通，努力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七志》和后来受其影响而编成的阮孝绪的《七录》是这

一时期内“最有影响的目录巨著，压倒了这一时期内一切的官修目录。”^⑥梁贺纵曾为《七志》作注，达七十卷，唐初马怀素整理宫廷图书时，还提出过续补《七志》的建议，可见其在当时和以后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总之，王俭是南朝宋齐革易时期政治和学术活动中的核心人物。他助肖道成篡政是顺乎民情、符合历史发展的需要的。他任尚书令的十许年中，对稳定社会，与民休息，开发江南，发展生产，对汉民族的历史是有贡献的。但王俭出身于王氏大族，是门阀制度的鼓吹者和维护者。他出于巩固齐王朝统治和维护门阀世族制的需要，对礼学、谱学和目录学的研究是有成绩的，在当时和以后都曾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很可惜的是，正当他年富力强之时就溘然去世了，这对南齐政权和南朝文化的发展都是一个莫大的损失。今天我们总结和分析王俭的政治活动和学术思想，一方面可以给王俭一个正确的评价，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对南朝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变化作历史的全面的深入的了解。

注释和参考文献：

① 据《隋志》、新旧《唐志》著录，王俭有《文集》等十四种著作传世，皆佚。今有马国翰玉函山房辑本《礼义答问》一卷；《丧服古今集记》一卷见存。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丁福保所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中，收录王俭策议赋诗（包括残篇）共六十余篇。

②⑳ 《昭明文选》，任昉《王文宪集序》

③⑨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

④⑥②④②⑦②⑨③④③⑤④⑥④⑦④⑧⑦⑤⑧⑩ 《南齐书》

⑤⑩⑪⑫⑬⑮⑰⑲⑳⑳⑳⑳⑳⑳⑳⑳⑳⑳⑳ 《南史》

⑦ 《北史》

⑧⑳ 陈登原《国史旧闻》

⑭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

⑮⑳ 《艺文类聚》

⑰ 以上引自《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⑱ 程应镠《南北朝史话》

⑳ 《昭明文选》，王俭《太宰褚彦回碑文》

㉔㉕ 范文澜《中国通史》

㉖㉗㉘ 《宋书》

㉙ 王应麟《困学纪闻》

㉚ 《新唐书·柳冲传》

㉛ 《通典》《食货门》

㉜㉝㉞ 《隋书·经籍志》

㉟㊱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㊲ 苏轼《东坡集》

㊳ 顾炎武《日知录》

㊴ 阮孝绪《七录序》

㊵㊶ 王重民《〈七志〉与〈七录〉》

㊷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